

·书里书外·

我所知道的杨振宁二三事

□李昕

我想说说自己和杨振宁先生长期接触,对他的一些印象。

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先生是目前世界上在世的最为伟大的(或者说成就最高的)物理学家(不是之一)。他和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宇称不守恒”理论,这对于杨振宁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规范场”理论,这个理论,按照邓稼先的话来说,是比“宇称不守恒”理论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理论。“宇称不守恒”理论影响世界可能是10年、20年,但是“规范场”理论影响世界可能是一个世纪。在“规范场”理论影响下,现在已经有3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3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所以很多世界著名科学家都认为杨振宁应该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

关于其他方面,我也有些了解,我只讲自己的两点观察:

第一,作为科学家,杨先生身上充满科学精神。你和他聊天,可以感到他兴趣广泛,不光是自然科学领域,就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他也关心,都有自己的见解。我给他编辑了三本书,每一次,他都反复推敲,反复修改,一丝不苟,而且全部按照自己的科学规范去编辑。他编《晨曦集》的几个月里面,和我通邮电大概也有100封。每一封信都极其简洁,用的是“电报式”的语言,没有一个字的废话。我注意到他不喜欢啰唆,所以我给他写信,凡是有问题,都明确列出1、2、3、4,他回复时,便按顺序答复。有时他的回信是这样的:1.同意。2.极好。3.可以。4.我再想想。

第二,他非常坦率、真诚,无事不可对人言。举几个例子。

他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那时是有特殊理



李昕 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编辑。

由的。但是他父亲不赞同这件事。他在文章里面说,父亲到死都没有原谅他加入美国国籍。这件事,如果他自己不说,有谁会知道?但是杨振宁很诚恳地讲出来,就特别让人认识到,他宣布放弃美国国籍是为了给他逝去的父亲一个安慰。这件事特别感动人。

他2018年在中国美术馆演讲,有听众提问,问他当初留在美国,是不是因为回到中国没有条件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他完全可以漂亮地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他回答说,我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确要依赖美国的科研设备和条件,但是我的“规范场”理论,那是回国也可以搞的,一个人在屋里就可以写出来。他并不介意人家可能会借此质疑他。在他看来,实事求是最重要。

在给他编《晨曦集》的时候,我们把封面拿给杨先生征求意见,他看到封面上印了一张照片,就说这张照片是13年前照的,显得他太年轻了。他要立刻再照一张换上来。因此他和翁帆商量,写了一封英文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I HATE pre-tension(意为“我很不真”)。同时给我写信说:95岁的人不该装年轻。

但这时正是1月下旬,北京最低气温零下17℃。杨先生要冒着严寒去照相,很容易感冒。所以这件事被翁帆劝阻了。最后书上还是用了这张照片。但是杨先生坚持,要在照片下面加一行字:“摄于2005年。”

我讲这些细节,是想告诉各位,杨振宁先生作为一位科学大师,有很多难能可贵的思想品质。也许正是这些品质决定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



摘编自作者《弱关联:在旅行中探寻检索词》自序。

显示,其中很多人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找到工作的。而且,对工作满意度高的,不是那些靠职场领导或亲戚介绍找到工作的人,而是以“偶然在派对上认识”的“弱纽带”为契机而跳槽的人。比起深度人际关系,浅层人际关系更能使人抓住成功的机会。

乍一看,这似乎令人诧异。假如你现在正在考虑找工作,你的好友和同事不仅知道你的现状,也了解你的性格和能力,他们只会给你介绍你可能会去的公司。而“偶然在派对上认识的人”却对你一无所知,他们有可能给你介绍你完全未知的公司。这里虽然可能存在一些严重的误解,但也有可能让你发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适应能力。

在思考社会动态方面,这种“弱纽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最前沿的网络理论中经常被引用。为了充实人生,“强纽带”与“弱纽带”这两个方面都是必要的。为了深入现在的你,强纽带是有必要的。但仅仅这样的话,你就会一直被环境牵制着,变成一台只会对输入的内容进行输出的机器。为了跨越它而让你的人生成为独一无二的,弱纽带是不可或缺的。

“弱纽带”充满了噪音,这种噪音正是一种机会。但是,网络却正在不断地开发消除这种噪音的技术。在如今的网络上,很难出现“在派对上偶然与人比邻而坐,就在一边觉得厌烦一边聊天的过程中,那些人却给自己介绍了某人”这样的状况了,因为一旦有一方觉得厌烦,就可以立即拉黑或静音。

那么,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弱纽带”和偶然的相遇呢?

是现实。是身体的移动,是旅行。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去劳动力价值,他们的时间将不再被征用,他被剔出了劳动力市场,成为失业者,成为多余人。

智能技术的广泛推进,必然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但随着很多人被排除出生产过程,自由时间的分配将更不公平地实现,部分人垄断自由时间,多数人无法享用时间自由的情况极易出现。

能够参与到劳动过程的人,其劳动时间能够售出,但其自由时间未必增加,因为他的价值会受到机器竞争者的衡量,如果不能比机器更有性价比,他的那一点“机器达不到的能力”也会不足挂齿。即使得到机器完全不能替代,这样的人也可能是寥寥无几,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整体处境。

退出社会生产过程的人获得的不是自由时间,而是“多余的时间”。因为无法获得报酬,时间对于他来说就很难用来去实现个人发展,他的时间开始失重,很可能只能打发度日,消磨时光。自由时间不是这样,它不只是属于个人,更重要的是它能成为个人积极生活的展开,这需要人获得了生活资源才有可能实现。退出社会生产过程的人,大概率只能由社会福利去保底,保底水平在不同地方自然有高低,但无论多高,都会形成对人的否定性的社会评价,从而使获得者形成弱者和底层的自定义,这并不利于其自由发展。

人工智能带来的时间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是人制造出来的智能技术,但要使它成为增进人的普遍福祉,而不是成为人自由发展的异己力量。它创造出来的自由时间能被多数人享有而不是被极少数人垄断,这一时间正义的实现需要社会分配机制的深刻变革。资本逻辑的分配必将带来重大的社会危机。因为大量的人被排出劳动过程,“按劳分配”将难以进行;“按要素分配”则导致财富被极少数人垄断。社会分配需要考虑到不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依然能够获得共享一定社会财富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自由时间。

社会一方面要保持效率,以实现发展上的追赶,一方面也要考虑公平,在技术激进变革的同时,考虑缩短工时,延长人们的自由时间,让更多的人在岗有劳,同时舒缓“以快为上”节奏下普遍的焦虑状况。

·序跋集·

我要向世界笑

□邹汉明



穆旦与夫人周与良。

穆旦(查良铮),中国二十世纪桂冠诗人、翻译家。生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死于心肌梗死,生命终止在五十九岁。

作为诗人,他摒弃一切陈词滥调,毕生追求新诗之“新”的本质,以一百五十余首现代诗,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范本,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作为翻译家,他勤勉地去做了一名语言的“他者”,来补汉语新诗的不足。他献身语言的一生,铸起诗歌与翻译的双重丰碑。

近日,《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由译林出版社



1947年2月,摄于沈阳。

出版发行,全书以穆旦生平为线索,结合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诗史互证”叙写“玫瑰与铁血”的人生传奇。

作者邹汉明历时十七年,查阅并整理大量未刊档案、抗战史料、个人书信、回忆录与日记,走访穆旦研究者陈伯良,诗人唐湜、郑敏,同事辜鸿高、董泽云夫妇,以及密友来新夏、杨苡等人,辅以六十幅珍贵历史图片,建构起多重记忆网络中的穆旦生活场景。同时,作为诗人与学者,他也结合自身对穆旦诗歌的细致解读,阐释其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先驱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我想,对于穆旦,从此我们不应该那么无视。”

我要向世界笑

□邹汉明

穆旦,一个躲在众多诗句中的名字;一个藏在汉语或说汉字中的名字。具体一点说吧,它其实就躲藏在百家姓的这个“查”字里。

当查良铮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个笔名的时候,还是南开中学的一名高中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五岁的他开始思考人生,写了一篇《梦》,告诉自己“不要平凡地度过”这一生。他把“查”字一拆为二,开始做起一个超过他年纪的半完美的梦。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似乎就喜欢拍照。他一生所拍的照片一定不在少数,若在一张长桌上排列开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约从一九三五年入读清华大学开始,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发生,这二十年间他的大部分照片都有着相似的笑容:一种鲜明的灿烂的微笑,尤其是右边脸颊的笑靥,无可遏制地从心底里洋溢而出。

如果就此认定他是一个性格外向的男孩,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相当拘谨,不善交际。朋友圈永远固定在不多的几个人。他斯斯文文,各科成绩也不错,却不足以引起老师特别的注意。与此相反,在文字里,他又显得老成。他睁着一双与其说热情不如说好奇的眼睛,一方面,老成地打量着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专注于省察自己的灵魂。

那时南开出来的学子比较注重仪表,一套中式长衫以及后来的学生装甚至卡其布军装穿在他身上无不得体。他头发乌黑,额头发亮,又才华横溢,朋友们一律称他“查诗人”。

他受英美文学的影响很深,也早早地接受了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如此,端正挺直的鼻梁底下,必然会出来一个勇于向现实发言的声音。面对危难重重的民国世界,他成长着,也经历着;感受着,也命名着。

诗人的笑并非固定不变,也绝不单一、浮于表面。这种笑,在他的诗歌中,比在他的生活中更早地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9)开头写大众脸上那种泛泛的笑,“他向我,笑着,这儿倒凉快”,在躲避敌机的紧张时刻,一位普通市民无所畏惧的笑,呈现出中国人天性中的乐观,这实在是战争和死亡所衬托下了的。

我们仔细分辨了一九四〇年代他写下的那些诗,吃惊于他竟然如此频密地写到了姿态各异的笑:既有“欢笑”(“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在昆明》),又有“疲乏的笑”(“疲乏的笑,它张开像一个新的国家”,《从空虚到充实》),“粗野的笑”(“我听见了传开的笑声,粗野,洪亮”,《从空虚到充实》),以

快览>>>

《中国考古百问》
刘文锁 著 中华书局

如何确定古物的年代?“九层妖塔”究竟是什么来历?谁家村宝藏的主人?有人把考古与古董收藏、挖宝、盗墓等联系在一起,这些真是考古学吗?本书由活跃在考古第一线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执笔,涵盖了九大领域,介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取得的重大发现,以新颖、巧妙的角度提出问题,引出专业、严谨的考古知识。

《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
战玉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法医秦明、马伯庸、雷米、陈思诚等悬疑推理一线创作者与复旦中文系学者战玉冰,13场深度跨界对话,直击中国悬疑推理创作现场,揭开爆款作品背后的思维密码。本书兼顾本格解谜、法医刑侦、硬汉侦探、历史悬疑、幽默推理、密室犯罪与谍战想象等多种风格类型,试图借此呈现出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化发展的复杂和多元面貌。

《给孩子的生命哲思》系列

曹文轩 著 张璇 杨博 田东明 须臾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四个充满诗意哲思的寓言故事,为3—12岁儿童构建了一座连通现实与想象的生命教育桥梁。将“相信奇迹”“感恩陪伴”“守护尊严”“学会放手”四大生命课题,转化为孩子可感知的成长密码。该系列延续了曹文轩特有的典雅文风,却以“非人类主角”的视角展开叙事。

及“忍耐的微笑”(“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笑”,《幻想底乘客》)。此外,还有“冷笑”(“多少个骷髅露齿冷笑”,《鼠穴》),“暗笑”(“不断的暗笑在周身传开”,《我向自己说》),“讽笑”(“当世的讽笑”,《控诉》),“嘲笑”(“每秒钟嘲笑我,每秒过去了”,《悲观论者的画像》)……

总之,诗人以他多层次的笑,立体地、意味深长地“笑着春天的笑容”(《控诉》)。许多年以后,我们认定他是那个时代最擅长书写各种类型的笑的诗人。

抗战兴起,他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穿上军装,应征入伍,去杜聿明亲率的远征军第五军报到。他以军部少校翻译官的身份奔赴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非常不幸,远征军经历了一次大惨败,他的部队被迫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从战场上归来,他觉出了活着的沉重和珍贵,从此变了一个人。生活在继续,肉体因穿越地狱而受到的创伤,终究需要诗歌的光芒来救治。这大约也是他此后一直没有放下诗歌的原因。

漫山遍野的死亡被他所目睹,最痛苦的人类经验属于他,灵魂的质地从此变得硬朗而深邃。在他最具传奇性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里,他不动声色地写到了一种非人间的、全然异样的、有别于他以前的“笑”:“没有人看见我笑”的无声之笑(“我笑而无声”)。

而在另一首也许更加深刻反思战争的长诗《隐现》中,他同样写到这无声之笑:“等我们欢笑时已经没有声音。”若非亲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人世间还有这样一种比哭更加可怕的笑。《隐现》还直接写到了这“笑”的反面(“……领我到绝顶的黑暗,/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哭和笑,构成了一个地狱归来的诗人最基本的面容。作为人类情感的两个极点,读者有必要把它们看成可以合并的同类项,也就是说,笑可以归并到笑中,正是这种合并了哭的笑,加重了分量,也内蕴着丰富的表情:痛苦的面容。用他的一行诗表述,即“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诗人早慧,又接受了最好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受到了艾略特、奥登等当时最前沿的西方诗的影响,所以,从根本上说,他是有养学的学院诗人。他毫不在乎公众所知的那套诗性语言。相反,他弃绝俗烂的语汇,弃绝一切陈词滥调,而偏爱于使用经过他大刀阔斧改造过的现代汉语。他敏锐地觉出了新诗之新的本质所在。他毕生追逐这种新奇,并无所顾忌地将全部才华倾注在这种直见性命现代白话中。他灵光闪闪,三十岁左右就写出了充满“发现惊异”的现代诗。他有理由进出这关乎灵魂的豪迈的大笑:

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
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
——《阻滞的路》

《他们仨》
刘黎琼 著 译林出版社

书写科研家庭温情日常和精神共振,呈现从迷惘到坚定的少年心,该书被誉为“科学世家的《我们仨》”。以十四岁少年的成长觉醒为主线,以科研人员的真实经历为雏形,创新性构建“三代同框”的时空框架,既呈现科考事业的壮阔艰辛,又捕捉家庭场景的细腻温情。读者可以在这一张一弛中,直观地感受到科研精神的代际传承与时代变化。

《隼》
[英]海伦·麦克唐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隼是现存速度最快的动物,它的速度、力量、美丽和凶猛使它成为数千年来的人类对象,所有的隼以同样的姿态再现,就好像它们都是同一只鸟,是亨利八世或成吉思汗放飞过的那只鸟。本书将科学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包含一百余幅图片,介绍了隼的完整历史,横跨全球、跨越数千年,并介绍了最新的科学发现。

《我的无重力人生》
[法]托马·佩斯凯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托马·佩斯凯,国际空间站的首位法籍站长,在这本自传中首次袒露从乡村少年成为星际旅者的完整心路轨迹。在这份生命记录中,佩斯凯带我们穿过宇航员培训的神秘帷幕,去感受火箭升空时肾上腺素的狂飙;我们还将与他并肩亲历空间站396天的真实生活,跟随他出舱悬浮于无限宇宙之中,以地外视角俯瞰蓝色母星的奇妙。(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被诬为对抗组织的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

是诗人后半生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六五年秋夫妇俩与四个子女的一张合照。照片上,他一反常态,严肃地盯着眼下这“严厉的岁月”。比对同一时期的几张证件照,我们同样发现了这一严肃的表情。不过,他很快就藏起这种怒容,竭力平和下来,甘愿屈居于僻静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整整十九年)。

一九七六年,即去世前一年,他集中精力写诗。从短短一年之内写出的这批晚期作品中,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前期那种丰富复杂、意味深长的笑。很有意思,晚期诗歌中的这种笑,经过了残酷岁月的改造、摧折,已经成了一种“抗议的大笑”(“……在雷电的闪射下/我见它对我发出抗议的大笑”,《城市的心》)。他不同程度写到的笑,我们粗略地统计一下,只有在舞台的演出节目中的“欢笑”(“慷慨陈词,愤怒,赞美和欢笑”,《演出》),也有“含泪强为言笑”(《诗》)的笑,但更多的似乎是“嘲笑”(“从四面八方被嘲笑的笑声”,《好梦》)……总而言之,那是从“历史的谬误中生长”(《好梦》)出来的笑,一种可笑的好笑(“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我看着都觉得好笑”,《听说我老了》)。他原先的微笑,现在终于变成需要寻找的一种表情(“去寻觅你温暖的阳光,会心的微笑”,《友谊》)。正像他在《老年的梦呓》中所说:“多少亲切的音容笑貌,/已迁入无边的黑暗与寒冷。”没错,无论如何,他的笑容在消失。所有这一切,暗示即使在他的“一本未写出的传记”(《自己》)里,也早早地成为一种私密下的笑谈(“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智慧之歌》)。

他的文学生涯,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创作和翻译两个时期。一九四八年前他主要搞创作,一九五三年归国后主要是翻译。

终诗人一生,他的不屈和无畏处,乃是在连译作也不能出版的日子里,开始了最辉煌的、长达一千余页的《唐璜》的翻译。可直到去世,译者也未见到译著出版。去世前几天,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反常地关照小女儿:“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这是何等的绝望!可一回头,他又安慰自己:“……处理文字本身即是一种乐趣。”轻轻的一句话,就又把自已拉回到了这“处理文字”的日常工作中。这种苦笑中的“乐趣”,一直伴随他生命的终了。

穆旦短短的一生告诉我们,任何时代,活着的艰难,和一颗有深度的伤痕累累的灵魂,都是文字难以尽述的。他献身语言的这一生,应该纪念牢记住英雄的名字一样,值得我们民族的语言牢牢地去记住他。如同军人用剑服务于自己的祖国,诗人用语言服务了他挚爱的国家。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图片均为译林出版社提供)

《他们仨》
刘黎琼 著 译林出版社

书写科研家庭温情日常和精神共振,呈现从迷惘到坚定的少年心,该书被誉为“科学世家的《我们仨》”。以十四岁少年的成长觉醒为主线,以科研人员的真实经历为雏形,创新性构建“三代同框”的时空框架,既呈现科考事业的壮阔艰辛,又捕捉家庭场景的细腻温情。读者可以在这一张一弛中,直观地感受到科研精神的代际传承与时代变化。

《隼》
[英]海伦·麦克唐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隼是现存速度最快的动物,它的速度、力量、美丽和凶猛使它成为数千年来的人类对象,所有的隼以同样的姿态再现,就好像它们都是同一只鸟,是亨利八世或成吉思汗放飞过的那只鸟。本书将科学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包含一百余幅图片,介绍了隼的完整历史,横跨全球、跨越数千年,并介绍了最新的科学发现。

《我的无重力人生》
[法]托马·佩斯凯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托马·佩斯凯,国际空间站的首位法籍站长,在这本自传中首次袒露从乡村少年成为星际旅者的完整心路轨迹。在这份生命记录中,佩斯凯带我们穿过宇航员培训的神秘帷幕,去感受火箭升空时肾上腺素的狂飙;我们还将与他并肩亲历空间站396天的真实生活,跟随他出舱悬浮于无限宇宙之中,以地外视角俯瞰蓝色母星的奇妙。(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